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殷企平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文化辩护书”： 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殷企平 著



“文化辩护书”： 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殷企平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ISBN 978-7-5446-2870-9

I. ①文… II. ①殷… III. ①文化-研究-英国-19世纪 IV. ①G1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81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870-9 / C · 0010

定 价: 4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

献给我的父亲殷作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走向平衡：卡莱尔的文化观	31
一、精神与物质的平衡	32
二、平衡背后的诉求	36
三、工作：通向平衡之路	40
第二章 《拼凑的裁缝》为何迂回曲折？	48
一、隐喻与象征	49
二、对机械主义的回应	53
三、延长感知 加深体验	58
第三章 卡莱尔“英雄”观的积极意义	68
一、对机械主义的反拨	69
二、“英雄”等于“超人”吗？	72
第四章 阿诺德文化观中的核心问题	79
一、问题的提出	81
二、阿诺德文化观的超越性	85
第五章 阿诺德对消费文化的回应	94
一、消费浪潮中的忧思	95
二、对历史语境的独特贡献	98
三、寻找药方	101
第六章 《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	107
一、潮起潮落为哪般？	108

二、夜尽了,昼将始	112
第七章 改革始于心灵: 金斯利的文化观	119
一、金斯利是“非利士人”吗?	120
二、改革始于心灵	124
第八章 卡莱尔主义,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131
——从《奥尔顿·洛克》中的麦凯之死说起	
一、卡莱尔的影响	132
二、选择基督教社会主义	136
第九章 对“破碎”的体验	144
——《酵母》的艺术形式	
一、“破碎”的形式	145
二、打破文学成规	150
第十章 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交融	157
——罗斯金的文化观	
一、转型与焦虑	159
二、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交融	163
第十一章 《金河王》的经济学寓意	173
一、财富是什么?	174
二、财富的得与失	178
第十二章 罗斯金与环境焦虑	184
一、对文化批评语境的介入	186
二、环境与焦虑	189
第十三章 艺术地生活: 莫里斯的文化观	196
一、继往开来	198
二、艺术地生活	202

第十四章 乌有乡的客人	211
——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	
一、回应“凑合的时代”	214
二、穿梭于现实与理想之间	217
第十五章 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	226
一、传奇题材与现实关怀	227
二、文化焦虑	232
总 结	239
一、文化概念核心内涵的形成	239
二、从“工作福音”到“艺术福音”	242
三、“衣服语言”：体现品质的审美维度	244
索 引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8

绪 论

本书可以看作《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①一书的续篇。那本书论证了 19 世纪英国优秀小说的史料价值,旨在说明小说家往往能够比其他人(包括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早、更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引起的问题,从而产生问题意识。书中所分析的每一部小说都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即发现并清晰地表达了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所形成的那种尚未进入史书的、压迫在人们心头的复杂体验。在论证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受到,如果我们希望聆听英国有识之士在快速转型的旋涡中所发出的心声,除了求助于小说以外,还要求助于文化批评。换言之,对社会转型作出重要回应的,不光有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 - 1870)、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 - 1863)和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 1819 - 1880)等优秀小说家,还有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 - 1881)、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 - 1888)、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 - 1875)、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等文化批评家。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梳理、培育和充实,卡莱尔等人创造了一个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批评语境,以此应对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

卡莱尔等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如果说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下提出的理想蓝图和哲理设计,那么它最早在英国赢得了实践的土壤。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最早发生于英国,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价值体系也最早成熟于英国。借用童明的话说,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主体论以及鼓吹“无限进步”的宏大叙述为特征的现代价值体系可以看作“现代性赋格”中的主题,而质疑它的思辨策略则恰似这一“赋格音乐”中的对题:

有一些思辨策略(critical strategies),是在质疑启蒙的现代价值体系中形成的,这些策略已成为后现代(postmodernity 或 postmodernism)理论重要

^① 于 2009 年 8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一维。“后”(post-)有“思辨”的含义,是后现代的语义之一,指的是对体系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的思辨。

……后现代也是现代,可称作“对位现代性”(当代理论常见的另一个用语),恰如赋格音乐中的主题和对题,一问一答,相互追逐。¹

19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正是这赋格音乐中的对题。针对(因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形成的)举世颂歌滔滔的局面,卡莱尔等人提出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文化命题: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高品质的生活?美好的社会究竟依赖什么?是依赖诱人的科技经济指标,还是别的更重要的东西?阿尔梯克(Richard Daniel Altick, 1915-2008)曾经指出,19世纪已经“有人认识到,英格兰希望建成的美好社会有赖于某种叫做‘文化’的东西”。²这里的“有人”其实就是本书要重点讨论的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他们对上述文化命题的一次次追问,宛若一本本“文化辩护书”。更确切地说,他们谱下的一个个篇章,汇集成了一部流芳百世、益人神智的“文化辩护书”。

作为专门术语,“文化批评”的走红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如戴维斯(Robert Con Davis)和施莱伏尔(Ronald Schleifer)所说,18世纪就已经存在一种“与启蒙理性‘秩序’相对的文化秩序”。³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在18世纪末写下的诗句就是一例:“我们那好事的理智,/扭曲了事物美丽的形式:——/我们解剖一切,却谋杀了生命。”⁴这里面就有批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文化”种子。如果类似的批评可以统称为文化批评,那么19世纪英国的相关著述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前文所说的“文化”种子,经由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等人的培育,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对文化批评传统的演进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存的有关文化批评的论著常常零零散散地提及上述作家,但是至今未见有人专门把他们作为特定群体或学术流派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例如,莱斯利·约翰逊(Lesley Johnson)的《文化批评家:从马修·阿诺德到雷蒙德·威廉斯》(*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1979)一书在讨论19世纪的文化批评家时,只是浮光掠影地涉及了卡莱尔,并且完全忽略了金斯利。又如,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 1929-)在追溯文化主义的思想源头时(除阿诺德之外)只简短地提到了卡莱尔和罗斯金,而对金斯利和莫里斯却只字未提。^①杜

① 见《文化的重大问题》(*The Fateful Question of Culture*, 1997)一书。

林(Simon During)编纂的《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1997)收录了各路名家有关“文化研究”的作品,其中涉及阿诺德和莫里斯的只有寥寥数笔,而对卡莱尔和罗斯金甚至弃之不顾。在中国,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涉足上述领域,但是对整个19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还未出现。本书的宗旨之一,正是希望弥补这一不足。

本书提出“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这一概念,属于一种尝试,在此之前,还未有人这样提过,但是依笔者之见,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西方文化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一环。要从事文化批评,就要确立并澄清“文化”概念,更要梳理并拓展“文化”概念的内涵。正是在这一方面,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等人做了根基性的工作。假如我们把西方文化批评史比作一幅故事画,那么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是其中包孕最丰富的“片刻”。我们不妨借用钱钟书先生论画的一段话,来说明那一“片刻”的重要性:

……莱辛认为画家应当挑选全部“动作”里最耐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一达顶点,情事的演展到了尽头,不能再“生发”了,而所选的那“片刻”仿佛妇女“怀孕”,它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⁵

“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这也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在人类文化批评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须强调的是,它不仅包含蕴蓄,而且是最富有包孕性的“片刻”,因为它适逢“文化”概念内涵演变的最重要时期。或者说,在19世纪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经历了最重要的内涵演变。这一演变根植于“现代性焦虑”,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

也就是说,“文化”和“焦虑”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竟然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要道出其间的缘由,还得从“文化”的定义说起。

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用的术语。然而,一谈起它的定义,仍然令人生畏。恰如弗伊利(Patrick Feury)和曼斯菲尔德(Nick Mansfield)所说,“很少有比‘文化’更成问题的词语了”。⁶迄今为止,不成问题的文化定义还未出世。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给过一个十分出名的定义,但是它也难逃被质疑的阴影。这个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养成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⁷

「文化辩护书」：20世纪英国文化批评

这样的定义显然大而无当。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 -)就曾这样批评道:泰勒的定义“几乎含糊得不能再含糊了”。⁸还有比这更含糊的,如在《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①一书中,上百个文化定义被逐一解析归类,“结果得出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⁹这样的分门别类看似全面,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读者仍然找不到中心。“文化”的“桀骜不驯”,自有其原因。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 - 1988)说得好:文化之所以是整个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概念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经历了好几种欧洲语言的历史演变,盘根错节,而主要原因是它目前已被好几个截然不同的学科用作重要的概念,而且被用在好几个互不兼容的思想体系中”。¹⁰由此看来,文化定义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因学科不同而不同。

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 1976)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对文化一词的拼写及其含义的嬗变作过梳理。英语 culture 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 colere,后者几经变体,如 coulter 和 cultura,慢慢发展为中古英语 culter、colter 和 coulter 等词,最终于 17 世纪初叶定格为 culture,其含义也由最早的“动植物的培育”渐渐发展为“心智的培育”等;如今常见的用法有三:1)形容思想、精神和审美演变的总体过程;2)表示一个群体、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3)指涉思想艺术领域的实践和成果。¹¹这样的梳理虽然提供了几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但是未能说明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对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来说,现代文化概念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似乎还得从威廉斯那里获取灵感。

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一书中,威廉斯首次指出,19 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关于文化概念演变的假说,即“一个时期的艺术必然跟该时期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结果是审美判断、道德判断和社会判断都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¹²威廉斯的贡献在于:他率先勾勒了上述假说的形成轨迹,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化一词的演变记录了人们对历史性变化的反应,即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做出的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该词的演变本身好比一种特殊的地图,从中我们

① 该书被不少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原文名为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1963),作者为克洛依伯(A.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

可以探索那些变化的性质”。¹³威廉斯此处所说的重大历史性变化是什么呢？从《文化与社会》全书的内容来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的转型，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惟其转型，所以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乃至总体生活方式的空前变化。

确实，在过去的三百多年中，人类社会的头号变化，非工业文明的崛起莫属。由它引起的社会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自然激发了文人学者们的回应，其内容和性质恰恰在文化概念的演变轨迹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概念的最重要内涵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虽然它还有许多其他内涵，但是上述内涵跟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我们的文化之旅从社会转型开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上文提到，威廉斯对文化概念演变的追踪紧扣社会转型这一线索，但是他在文字表述上没有直接使用“转型焦虑”这样的字眼。倒是哈特曼的有关论述更为简明扼要：“到了穆勒、阿诺德和罗斯金的时代，出自对于文明的肤浅及其悖逆自然的效应的焦虑，开始赋予‘文化’一词以新的价值含义。”¹⁴此处的关键词是“文明”和“焦虑”，也就是对工业文明的焦虑。另一组关键词是相关的人名，其中又以阿诺德最为关键。当今西方世界，凡是探讨文化定义的论著，几乎言必谈阿诺德以及他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1867-1869）。该书前言中有一段涉及文化性质和功能的概述：

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虚幻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弥补过于机械刻板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我们所推荐的文化，首先是一种内向的行动。¹⁵

这段文字传播很广，其中引用率最高的要数“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一语。它还常常被单独用作阿诺德关于文化的定义。事实上，这句名言一旦成为“孤家寡人”，就毫无意义。换言之，对它的理解必须结合上下文，尤其是对机械主义的批判——光是上面这短短的引文中，“机械”一词就出现了两次：“我们……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和“机械刻板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机械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遍布《文化与无

政府状态》全书。例如,该书第一章《美好与光明》中这样强调:“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¹⁶在紧接下来的一页,阿诺德再次强调:“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¹⁷“机械”和“机器”等词语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自然有其深意。阿诺德是要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推崇文化,是因为他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问题,即新兴的工业文明仰仗的是机械力量和物质力量,缺失了精神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要用文化来(如上引《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前言中所说)“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里要冲击的,正是前文所说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

也就是说,就过去三百多年的人类社会而言,文化诞生于焦虑: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或者说机械文明引起的焦虑。机械文明带有盲目性,其后果之一是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过快,导致新旧世界之间的断裂,即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而新体制和新学说还来不及诞生。这一情形在阿诺德的著名诗句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去,
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我的头脑无处依靠……¹⁸

透过这些诗行,我们看到的是深深的文化焦虑:新旧世界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的畸形发展(也就是前文中哈特曼所说的“悖逆自然的效应”),而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原因又跟上文讨论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密切相关。

在世界文化史上,阿诺德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不过,他并非用文化冲击机械主义的第一人。称得上第一人的是卡莱尔。虽然如前文所示,哈特曼没有提到卡莱尔,但是后者表达的对于机械文明的焦虑,无疑赋予了“文化”一词以新的价值含义,而且比哈特曼所说的时间更早。事实上,是卡莱尔最早地、明确地把工业化时代称作了“机械时代”,这一命名首次见于他的名篇《时代的特征》(“Signs of the Times”, 1829):

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我们没法把它称为“英雄的时代”或“虔诚的时代”,也没法把它称为“哲思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的时代”。¹⁹

至于“机械”的含义,卡莱尔也作了解释,而且是迄今为止最精辟的解释。他指出,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的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有人类的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有人的行动方式,而且有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详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些批评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被威廉斯点破:“在卡莱尔那里,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明显地得到了新的增强。这种文化观是他抨击工业主义的基础:一个社会若要名副其实,维系它各个组成部分的手段就应该远远不止是经济纽带,应该远远超越那种以现金支付为唯一联结的经济关系。”²⁰这段话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1)“现金联结”(cash-nexus);2)“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熟悉卡莱尔的人都知道,“现金联结”也是他的名言之一,被用来描述19世纪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²¹这种依靠现金来联结的社会,所奉行的正是单向度发展的机械主义原则,而一个民族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多向度的,是讲究整体性与和谐性的。换言之,对于这种机械式文明的焦虑,从卡莱尔起就已经渗入了文化概念内涵的演变过程中。

当然,卡莱尔并非凭空就具备了回应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的能力。就思想源流而言,卡莱尔直接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的影响。关于浪漫主义诗人对工业化的回应以及柯勒律治对卡莱尔的影响,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特别指出,虽然柯勒律治没有直接使用“culture”一词,但是他笔下的“cultivation”就是“文化”的意思,而且“就是从柯勒律治时代开始,文化概念决定性地进入了英国的社会思想”。²²需要补充的是,卡莱尔还深受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 1730 - 1788)、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 - 1803)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 - 1819)等德国浪漫派思想家的影响,后者曾经掀起一场“反启蒙运动”,其宗旨跟机械主义思想正好相悖。^① 还须指出的是,在卡莱尔之前,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 - 1805)和诺瓦利斯(Novalis, 1772 - 1801)等德国文学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直接表述过对于以“机械的崛起”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焦虑。譬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1794)中曾经指出,现代文明的特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小节。

点是“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²³不过,卡莱尔是明确地把工业化时代称为“机械时代”并对其全面解剖的第一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居功至伟。

更确切地说,作为批判机械主义的基础的文化观在卡莱尔那里已经成熟。如前文所述,这一文化观经阿诺德之手得到了充实。这种充实在阿诺德之后并没有停顿,而是一直延续至今,途中参与充实的文人学者可谓群星灿烂,其中必须一提的有英国的罗斯金、莫里斯、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威廉斯、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以及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法国的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格林布拉特和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德国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 1900-2002)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等等。经他们之手,“文化”不断改头换面,并派生出诸如“文化霸权”、“文化唯物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工业批判”、“文化诗学”、“文化无意识”和“文化资本”等新术语,还引起了层出不穷的纷争。^①以笔者愚见,“文化”万变不离其宗。就其“转型焦虑”这一主要内涵而言,文化概念形成的基础性工作在19世纪已经完成。对这项基础性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的,不光有前文介绍的卡莱尔和阿诺德,还有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

虽然金、罗、莫三人没有像阿诺德那样,直接以“文化”为标题发表过专论,但是他们的文化观几乎渗透于各自的每一部作品。跟阿诺德一样,他们几乎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都提出了与社会转型有关的问题,而且在具体表述上也跟阿诺德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例如,金斯利就曾经提出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见本书第七章第一小节),其内涵与阿诺德的文化概念并行不悖,也深深地扎根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焦虑。又如,罗斯金

① 关于这些术语,赵一凡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以及他的专著《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中都已介绍,此处不再赘言。

在《给这后来者》(*Unto This Last*, 1862)一书中有一个论断:“治理与合作在所有事情中都是生命法则,而无政府状态与竞争则是死亡法则。”²⁴这里说的其实就是文化问题,其实质曾经被威廉斯一语道破:“(罗斯金的这个论断)再次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对照,只不过这一次的措辞直接对19世纪工业经济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挑战。”²⁵威廉斯这里指的是罗斯金和阿诺德之间的巧合——后者的代表作题日本身就是《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类似的巧合还出现在莫里斯和阿诺德之间。跟阿诺德的诗句“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样,莫里斯也在文字上直指社会转型:“我们觉得自己身处新旧世界之间……期待着变化的来临。”²⁶这些小小的巧合,使我们触悟了极重大的问题——浓浓的转型焦虑,沁透于所有这些有识之士的文化情结,埋养在他们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他们的诗文篇章里。

更富有意义的是,上述焦虑不但导向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批评实践,而且最终化成了有关理想社会的愿景。

事实上,任何有关文化概念内涵的探讨必须回答这样两个问题:1)文化是什么?2)文化能做什么?二者无法截然分开,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文化是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时,同时也暗示了文化的功能,即化解这种焦虑的功能。

文化怎样化解焦虑呢?

其主要手段有二:一是从事批评,二是提供愿景。莱斯利·约翰逊(Lesley Johnson)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凭证:文化概念“对(19世纪)社会批评传统来说,起着中心作用。这一批评传统把艺术想象作为社会的道德力量,而且把它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性机制”。²⁷下面这段话说得更为明白:“在19世纪,文化概念大体属于文学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当时对英国社会的不满、抗议和批判主要来自他们,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传统,而文化是他们用来表示这一重要传统的术语。社会潮流的走向,让这些作家痛心疾首,而文化概念则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同时彰显了他们的社会关切以及他们提供的建设性愿景。”²⁸在约翰逊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约翰逊没有提及金斯利,但是后者的功德不容忽视。简而言之,他们都在社会批评和描绘愿景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鉴于上文已经涉及卡莱尔和阿诺德所从事的社会批评,此处只就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的有关工作略作补充。

先说金斯利。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酵母》(*Yeast*, 1848)、《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 1850)和《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 1863)这

三部小说——都交织着浓郁的文化情结,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诗性语言来质疑机械主义思维方式。在这一方面,他与卡莱尔一脉相承。小说《奥尔顿·洛克》的副标题——“裁缝和诗人”(Tailor and Poet)——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主人公洛克的裁缝身份影响了整个故事的进展,这实际上是呼应了卡莱尔的名著《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 1833-1834);后者既以衣衫讽喻历史(人类的历史被戏讽为不同服装互相更替的历史),又以衣衫暗指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即灵魂的丧失。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失衡的现象,始终是金斯利关注的焦点之一。为矫正这一失衡现象,金斯利投入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是19世纪英国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不妨看做他人选本书重点讨论对象的原因之一。

再说罗斯金。跟卡莱尔、阿诺德和金斯利一样,罗斯金也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所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最大特征是国家以及个人身上的某一种禀性或能力特别发达,而其他禀性和能力却急剧萎缩。在《芝麻与百合花》(*Sesame and Lilies*, 1864-1865)一书中,他哀叹英国大众已经失去了许多应有的能力,尤其是阅读和思维的能力,而祸根又恰恰是对钱财的贪欲:“眼下英国公众完完全全地不可能读懂任何思想深邃的作品——他们的贪婪是如此疯狂,以致变得不会思考……凡事都得有‘回报’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每一项目标……”²⁹这种“反文化”现象意味着国家和个人都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和谐状态,而文化则意味着对整体与和谐的追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席勒曾经哀叹现代文明把人变成了机械生活中的碎片,这也正是罗斯金焦虑的原因。比席勒更进一步的是,罗斯金把整体性的丧失明确地归咎于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分工劳动可真是伟大文明的一大发明。近来我们把它又研究并完善了一番,只不过我们给它取了一个虚假的名字。说实话,我们并不是在分工,而是在分人——人被分成了一个片断——分解成了生命的碎片和细屑。结果,一个人的智力所剩无几,甚至不足以制造一枚别针或一颗钉子。仅仅制造针尖或钉子头就耗尽了一个人的智力。”³⁰罗斯金关注的还不仅仅是因分工而引起的异化。如戴维·希克瑞所说,罗斯金的批评理论分别“由以下几组分离而生成:思想与感受分离;时间与空间分离;肉体与灵魂分离;行动与意图分离;计划与实施分离”。³¹换言之,罗斯金是从整个文化层面上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或和谐性遭受侵蚀这一问题的。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